

新作新评新力量

——2021年全国大学生“文学新作新评”征文活动获奖作品选登

欲望深渊与群体救赎的光芒

——评李宏伟《灰衣简史》 ■ 朱霄



朱霄，女，宁夏固原人。暨南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19级本科生。

由暨南大学文学院、暨南大学中华文化港澳台及海外传承传播协同创新中心、广州市文联、广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联合主办，《文艺报》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提供学术支持的2021年全国大学生“文学新作新评”征文活动，自2021年5月发布公告至9月30日截稿，共收到来自大陆及港澳台在读大学生稿件近千篇。征文组委会对稿件进行了匿名初评和终评，最终评选出38篇获奖作品。

参赛作品中以2020年至2021年发表出版的文学新作为主要评论对象，既有对《晚熟的人》《一把刀，千个字》《烟火漫卷》《文城》等名家作品的评论，也关注到班宇、路内、王占黑等青年作家，展示了新一代大学生开阔的阅读视野、多元的审美趣味和崭新的表达风格。“文学新作新评”为青年学子的锐评新论提供了舞台，《文艺报》特刊发部分获奖作品，以展示当代文学评论新生力量的优秀风采。

——编者

构脱出桎梏，引发的思考就显得更为深远”。结构的创新给内容的叙述带来新的可能。故事行进中采用了三种不同人称，在解构人类的同时，将灰衣人拉下过程里。写作的取量框在这一过程里不断发生位移，阅读随之会略置阻难，但最后的回环也因此获得了更大的成功。从具体的现代故事延伸，灰衣人行走的场景已经纵贯了整个人类历史，甚至是千百年以来灰衣人执着的现实投射上。

故事的内核始终聚焦在人类自身与“欲望”的纠葛中，而叙述的逻辑则建立在对主人公“欲望”与“死亡恐惧”之间的哲学辨析之上。初始，我们的阅读跟随王河的视角，直入了他在死亡阴影之下自主填充的欲望世界。王河少时即见死亡。这场死亡伴随着他孩童时代，是美好意象寄托下的悲剧。当有人彻底离开，世界便携带新鲜的漏洞继续前行。少年偶然意识到了这种持续且无法逆转的空缺，死亡恐惧因此成为他长久难以排遣的折磨，也成了他欲望的原罪。

不同于王河“伴虫成灾”式的恐惧，冯进马对死亡的认知产生于物质和情感疏离之后，这种逐渐明晰的意识映射着他的内心。他追求将万物的那种纯净提取，试图将被X光扫射后的动物图像以还原成真实地体现出来。这一行为不只是想要证明影子存

在与否，也标志冯进马开始走向了对死亡的探索。然而，他“放弃现有的一切，为了并无必要的影子”，看似修正过去，反省自身，实则隐喻着冯进马拥抱黑暗，试图挣脱死亡，离老人的园子更近了一步。但在这场人性与欲望之间的拉锯战中，仍有救赎的光芒执着加在黑白画作上的斑斑，童声无忌的“为什么”，都在强行平衡着被时代困囿的人类，把对欲望的解法无声地融入生活。

“幼稚”自有无法推拒的生长力量。在对主要人物的书写中，何家姐妹、中年女演员、进入园子的母亲和女儿身上出现了与前文不和的声音。何家姐妹愿意献出自己的影子，她们的“欲望”在于满足冯先生的欲望。何芃在每次拍摄动物都显得迟滞痛苦，冯进马却有抑制不住的兴奋，在老虎停止吼叫时，何正无声地望向橱窗，即使祈求去无效。中年的女演员放弃了曾经追逐过的梦想，不再执着形式上的肯定，接受灰衣人的下一步诱导，最终达成了自己的和解。随母寻亲的女儿提出一连串为什么，令中途阻挡的灰衣人哑然。她纯净的眼神与欲望无关，正是打动老人的重要原因。在这两种人物的对比之中，我们看到了欲望对人类的操控，也该读出了脱离掌控的秘密。

此类题材人物都被设置为女性，她们的抒情能力更强，欲望少有外显，力量往往居于弱小地位。何家姐妹性格较为相似，以他人施予的援手作为

自身的精神支持，她们并不关注个人欲望。女演员的一生则突出了“转变”的过程，诱发了我们思考生活琐碎对每个人而言的隐喻意义。小说未溯到人们寻同的终点，小女孩代表的意象显然是初生之纯洁，其母亲则有带着苦难经历造就的调感。寻同源于为了满足欲望，但女人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爱情，孕育了新的生命，她的欲望在逐渐转移，可以说是被不断稀释。

在对这些形象的塑造中，四面八方的光渗透了这片历史的黑暗。她们以“不成熟”的个性和想法，试图消解图城之中的阴影，这也使小说的反思进一步深化。当然，正途并不难寻。救赎的光芒时刻笼罩在黑暗之下，用轻盈缓慢的力量化解人类欲望和暴力的祈求。无论是浅层的金钱欲望，还是更深层次的死亡恐惧，都可以说是其相世界在表象世界的“影子”，它们在人类的禁锢下服从着公义、原理、定义、规则，在极度紧绷的情况下异化出过度的欲望，偶尔呈现出极端化的特点。影子是欲望的化身，欲望是灵魂的轻盈外显，有了更为具象的祈求。浮士德中借出了瞬间的满足和美丽，抱着高度幸福的困惑而死；灰衣人仍在欲望中跋涉，与千年的困惑继续纠缠。

“中山将崩”，情感尽现。物欲时代里，我们在寻找浮世本心。(本文获本科生组特等奖)



王秋实，男，吉林省吉林市人。兰州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2021级硕士研究生，本科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

空洞的神话与失落的先锋

——评余华小说《文城》 ■ 王秋实

的变化，缺乏足够的“人物景深”。从这个角度而言，林祥福无疑导致了《文城》中的母题被虚置。

除此之外，《文城》的叙事也存在着重主题处理的含混与模糊以及核心要素的缺失。早期他通过白描式、漫画式的策略对人性之丑恶进行了成功的刻画，但并不代表他已成功诠释人性之美。因此在《文城》中暴露了这一潜伏已久的症候，最终导致了《文城》中的温情书写过于含糊且牵强。就主题而言，“寻找”的核心要素在于人的成长与追问，“命运”的核心要素在于人主体意识的展现。然而在《文城》中，这些核心要素大多数情况下是缺位的，“寻找”与“命运”究竟何以与何为，我们未能收获状况的答案。林祥福在小说中的状态更多的是“等待”而非“寻找”，人物没有发生明显的成长或蜕变，这导致了“寻找”母题的含混与缺失。与此同时，余华似乎难以以取舍东西方的两种命运感，既表达了占希腊悲剧式人与命运的两相性对抗，又借鉴了中国“顺应天命”的传统思想，结果在悲壮扯扯间令“命运”出现了与“寻找”相悖的症候。归根结底，文学处理与人物形象（人性）是互为因果的辩证关系，但余华在母题二者附的失误令《文城》的文本“不知所云”。

《文城》显然代表了他继《兄弟》之后的又一次转型，标志着其对现实伦理的“主动批判—被动妥协—主动配合”过程的完成，长期指导着余华创作的先锋思想也走向式微。文本内容普通、平常，缺乏震撼人心的哲学与情感的言说，甚至连最能体现余华个人风格的话语狂欢与叙事重复等写作策略也没有出现。这似乎表明余华已经放弃了先锋哲学，也放弃了“先锋”所指——文学的新启蒙。现实的建构、虚构的自我增殖与先锋哲学的失落，令《文城》中建构的乌托邦走向了悖论性的命运。读者只看到了“善息有报，天道轮回”的宿命思想，这正体现了导致了该小说文学品质与意义的下滑与流失。

《文城》的创作显示了余华在转型过程中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表达路径，没有与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达成新的平衡与诗性正义之权威的消解。以上都导致了《文城》所建构出的美好人性神话空洞无力，难以承载其试图描绘的美好理想。亚里士多德利用摹仿论声明了虚构的合法性，然而当虚



王秋实，女，四川成都人。江南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19级本科生。

马华文学在马来西亚本土一直处于非主流的尴尬地位，马华作家也属于双重边缘的文化群体。黎紫书并未亲身经历“历史困境的重负”，也少其挥之不去的身份焦虑，这使她在马华文学传统中的沉积感薄之外，更添一种酣畅神秘。在《流俗地》里，黎紫书选择落地生根，以言文很重的经历为线索来描写马来社会几十年的风云流驶。从时间上来看，上世纪60年代及以前的政治和种族纷争已成为华族难掩的创伤，70年代出生的她若曾写国家大义容易陷入架空历史的模板两可中；从空间上看，她不同于出国旅台的马华小说家，作品言反反而显得独具特色。“若若不写，无人能作”这种“舍我其谁”的态度不是自负，而是这位马华作家对马华文学的清醒自勉。

黎紫书在《流俗地》里紧贴马华风土，摒弃了东南亚华文文学常见的异质观照的“南洋视角”，而将叙述视点放置在马华社群的“流俗”之中，表现出较强的“在地性”。马来西亚是多元族群社会，马来人、华人、印度尼西亚人和印度人混居，在书中，细腻、细腻和印度人拉祖共同生活在楼上楼下，一起学习 and 玩耍，缔结了深厚的友谊。楼上下成为一兼具“全球性”与“在地性”的场域，成为二者合一的、既流俗又抵抗流俗的“乌有之乡”。三人从楼上楼下的“流俗”走向社会之“流俗”的过程，似乎也伴随着族群在大时代中，沉浮却无力的命运。

黎紫书在大德威称为“黑暗之心的探索者”，是阴森幽暗、中国式“过日子”哲学中的诗意书写者。每一次的折返与“悼念”都以漫游叙事与“在乡—离乡—返乡”模式的交互巧妙疏离了现代时间体验。

“漫游”中遭遇“顿挫”，“回乡”却通往“反叛”。《小花旦》中人物的走走停停就如此在都市漫游书写的序列中完成了一次翻转，“上海遗落者”游荡于“现代”与“传统”的序间，心理感也由此得到了捕捉。

《小花旦》中，老妇扔下一片，免费的超市班车消失成谜，报亭、桥洞、鸽子笼也终将易主，但那些入、那些声音、那些物、那些漫游过的那些影像，终是跳出文学史长廊“都市经验”——以贵族的欲望展开与繁缛不休的仿逝情调，顽固地在都市上演着一场又一场针对时间感却又富有韧性的博弈。(本文获研究生组二等奖)

“《文城》的叙事暴露出了鲜明的单向度特征，人物形象过于扁平化，往往“非善即恶”，而善者又对恶人形成了全方位的压制。余华或许想建立一种但目意义上的诗性正义，然而作者对于文本和人物过度的介入与操控导致了诗性正义之权威的消解。以上都导致了《文城》所建构出的美好人性神话空洞无力，难以承载其试图描绘的美好理想。亚里士多德利用摹仿论声明了虚构的合法性，然而当虚

《文城》的创作显示了余华在转型过程中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表达路径，没有与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达成新的平衡与诗性正义之权威的消解。以上都导致了《文城》所建构出的美好人性神话空洞无力，难以承载其试图描绘的美好理想。亚里士多德利用摹仿论声明了虚构的合法性，然而当虚

历史缝隙中的生命絮语

■ 王振锋



王振锋，男，河南南阳人。南京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20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

在《一把刀，千个字》中，王安忆以一种极其低沉的叙述语调，叙述了一群深陷历史图囿之中的平凡人尴尬而又苍凉的人生际遇。深埋于他们内心深处创伤和隐痛，常常在不经意间被窥破、被刺穿，于是他们不得不将自己封裹起来，在个人孤绝的世界中微弱地呼吸，呈现出一种无边际的疏离之感。这种疏离是全方位的，它不仅体现在人与性的历史时间和多维的现实空间之上，而且还包括人与人乃至人与自我之间的疏离。

先谈人与历史的疏离。人作为一种社会的人，不仅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而且还是身处社会和历史的个体。与《长恨歌》不同，在《一把刀，千个字》中，王安忆放低了叙述的姿态，让人物按照自身命运的发展逻辑来建构故事，无论是平铺直叙的日常生话，还是宏大高蹈的价值理想，都不再强制性地向人赋予某种观念和使命。这里所说的人与历史的疏离，并非人与历史的脱节，而是人与历史的种种观念之间发生了某种抵牾；并非人物不愿意参与到历史的进程中去，而是在主动参与或被动卷入之后，发现了历史与个体的革命理想相去甚远，于是陷入了“无物之阵”，感到无助、彷徨。小说中“母亲”的悲剧命运，正是由于她的革命理想与具体的历史实践之间产生了巨大的裂隙，无法弥合，选择悲愤自杀。

这种人与历史之间的疏离，直接导致了小说中人与周遭世界的疏离。小说中人物在空间上不断迁徙。作者在叙事过程中不断地转换叙事空间，从扬州到哈尔滨，从高邮到上海，再从旧金山唐人街到纽约法拉盛，这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流徙之痛与“不知何处是归途”的漂泊之感，氤氲在小说之中，盘旋不去，使得他们与周遭世界始终处于若即若离的悬浮状态，小人与周遭处于无限放逐之中。

无论是人与线性历史的疏离，还是人与生存空间的疏离，在其具体的表现形态上，都会呈现为人与人的疏离，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个体裂隙。小说中所有的人物关系，无论是父子、夫妻、兄妹、还是情人、朋友和邻居之间，都普遍处于一种严重的隔膜和不相通的状态，人与人之间交流也总是处于一种浅尝辄止的浮表状态。这种相互抵触就注定了其伦理关系的脆弱不堪。小说中人与人之间始终无法形成心灵的深层对话。

从更深层上来讲，这种这种孤独和苍凉的生命情调，其根源在于“我无法与自己和解”的内疚感，这也直接导致了人与自我之间的疏离。正如小说中所叙述的那样：“医师的胡蝶蛋催催了交流中的危险。这危险具体是什么，他说不上来，但又无时无刻不感到它的存在和威胁，像水底的暗礁，稍不留意就会翻船。而他们的家人，似乎是一个特别警觉的动物，稍有风吹草动，预先绕开。更彻底的做法是缩在自己的壳子里，与外界筑起一层厚厚的屏障。”

《烟火漫卷》出版之后，网上不乏对于作家写作的质疑之声。很多人感觉迟子建“太远”都是那么一种风格，“缺乏变化”、“感觉就没有离开过黑龙江”。笔者认为，小说中运用了多种复杂的叙事视角而非单一视角，创造出一种“群星闪烁”多线并行而非“众星捧月”的人物画廊格局。

哈尔滨作为本书最重要的文学现场有着着悠久的历史，没有任何一种“大人物”典型性能够代表哈尔滨城市文化。因此作者面对多面复杂而本性纯粹的人物时，采取理解视角而非评判视角，创造出一种“群星闪烁”多线并行而非“众星捧月”的人物画廊格局。

《烟火漫卷》出版之后，网上不乏对于作家写作的质疑之声。很多人感觉迟子建“太远”都是那么一种风格，“缺乏变化”、“感觉就没有离开过黑龙江”。笔者认为，小说中运用了多种复杂的叙事视角而非单一视角，创造出一种“群星闪烁”多线并行而非“众星捧月”的人物画廊格局。



李倩茹，女，山西大同人。山西大学文艺学专业2019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理论与批评。

等待时间穿过的诗意叙事

——读班宇的《缓步》 ■ 李倩茹

在地图指出了一种危机：人的身份倾向于平庸，精神走向困倦，于是无法回到真正的本相。在这一意义上，作为联结点的麻木，尽管已成为社会意义上的某个角色，但至纯至真的心性足以折一切本相，在打破被固化的角色意义同时，也因此成为了“我”寻找光芒的管钥。

如果说对角色的认知与选择是班宇新的探索命题，那么借“水”意象实现的诗性表达是其不变的恒定内核。班宇的叙事语言是理性的，节奏是灵动的，二者之间的张力构成了小说的诗意。相比之前的创作，《缓步》则更像是处在起伏之间的一次顿悟与重生。班宇以叙事之网捕捉每个水下时刻，寻求一种过往经验的变形，将记忆深处的瞬间打磨成晶莹，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一次次的自我实现和精神突围。而走入水中的结局既是班宇诗性发展的异质叙事空间，也是对于日常生活荒诞性的深度挖掘。也是对叙事的意义荒诞性一瓦解，展现出逻辑的多样性与多元性，也让小说的诗意得以可能。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试图圈



罗新辉，女，福建漳州人。厦门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2018级本科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理论。

“非欧儿里得时间”中的历史寓言

——试析长篇《民谣》的叙事特征 ■ 罗新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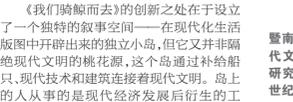
相关。第一人称作作为一种具有极高限制性的叙述视角，在讲述故事的时候承担着相当程度的“风险”。将故事的唯一权威话语声音置为一个精神方面有障碍的病人，其实是文本中一个相当叫人玩味的细节。文本中的交错、不断闪回的“非欧儿里得叙事时间”，其实是不可靠的叙述者的疾病投射。碎片化记忆在这部小说中以碎片面目出现，用以讲述整个“文革”时期的“不正常”。这也进一步佐证了文本中的碎片化时间设置与患病个体、时代环境之间存在着深刻联结。

而当作家借由非线性的时间通史来触媒本土中国及其背后隐没的历史寓言时，这种反传统的有什么独特本身为史和历史的意义又有什么形态对应呢？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秩序发生了重大变化，再加上想象力与结构力的弱化，小说写作的潜力逐渐丧失。当下小说界需要进行一场新的“革命”。一方面，“非欧儿里得”式时间结构是小说“打破循环”主题表达的重要工具。无论是相对封闭、固化的乡村历史，还是开放、未完成的当代现实，非线性叙事时间带来的动态化叙述，非线性叙事时间带来的动态化叙述，非线性叙事时间带来的动态化叙述，非线性叙事时间带来的动态化叙述。

当然，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关注到，“打破循环”的理念召唤着一种潜沉于历史表层之下的生命力，打破循环并非仅仅是打破封闭空间和单向度的时间本身，更是在完成对一代人的精神拯救。拯救每一个被因于环境枷锁之中倍感无助的困感的人。(本文获本科生组二等奖)

未能归来的逃离

——评孙频《我们骑鲸而去》 ■ 黄魏越



黄魏越，女，深圳人。暨南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20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新世纪文学。

《我们骑鲸而去》的创新之处在于设立了一个独特的叙事空间——在现代生活版图中开辟出来的独立小岛，但它又并非隔绝现代文明的桃花源。这个岛通过补给船、现代技术和建筑连接着现代文明。岛上的从事的是现代经济发展后衍生的工作。所以他们在并非荒岛求生，重建文明秩序，而只是在相对空旷的领土上对现代文明延伸和复制。这意味着，他们逃脱了有形的现代文明，却无法逃离心中无形的现代文明，他们无法创建新的秩序，也就无法逃脱现代文明的枷锁。唯一为这困境给出一点指引的人是老周，每天上演的世界剧场，让他的生命拥有了翻倍的容量。他是唯一一个试图用心秩序抵抗现代文明秩序的人。

小说有很强的“原点”辩证观念，起点亦是终点，边缘亦是中心。大海是文明的起源，人类的生活由海洋生物进化繁衍而来，而在小说中保留最后一点人性和文明痕迹的老周选择的最终归处也是大海。老周、“我”、王文兰在荒无人烟的小岛上被放大，仿佛也是世界中的中心，观剧元素的融入不仅形成了一种广阔的“看”与“被看”的辩证对应结构，还搭建起了广阔多层次的叙事空间。

然而，孙频所设置的无限循环的辩证义又要指向何处呢？小说中老周借《麦克白》中主角最后的自白，捕捉了这无尽的“看与被看”中戏剧的虚无：“它是一个愚人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和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虚无似乎成为了小说最后的归宿，喜怒哀乐都不过是无意义的表演，而小说中



孙频，女，浙江嘉兴人。暨南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20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新世纪文学。

人物的选择更不是走向空旷的虚无；“我”又复归到人群中，生活并未因此而有一丝改变；王文兰依旧在岛上活出人样，而她的抱负注定无法实现；老周回到了海洋，成为了具有中国“隐逸之士”气质的人物，但我们无法解释回归海洋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世界格局，让他的生命拥有了翻倍的容量。他是唯一一个试图用心秩序抵抗现代文明秩序的人。小说开头的雨，却不知道向何处，如何归来。本书末尾的访谈《所有逃离皆为归来》一文中，孙频提到，什么样才是更好的生活只是一个无法有定论的问题，人的千姿百态会产生出千姿百态的生活和结局，这似乎解释了她平淡结局中不指明出路的原因，但又难免有些牵强，至少我们无法否认，对剧中权力掣肘、人际关系冷漠无情的境况的否认是本书中人物“出逃”的前提，而这样的出路绝不会是千姿百态的生活中的一种。孙频带着读者和人物逃离到避世感中，却忘了归来，读者和人物迷失在空旷的文本中，被庞大广袤的海洋吞没，一如孙频在小岛上第一眼看到海洋时那样空虚震撼。(本文获研究生组三等奖)

“都市经验”的翻新：声景·自然物·漫游实践

——《小花旦》读札 ■ 宋昕悦



宋昕悦，女，江苏南京人。复旦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21级硕士研究生。

王占黑在采访中自言：“我已经走出社区了”，这标志着《双响炮》(街道江湖)到《小花旦》漫游版图的扩张，但这次扩张并不越限于上世纪30年代海派文学与90年代都市文学中“空间—意识形态(或历史)”的布局，漫游者的心理景观亦无法纳入19世纪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时代新兴城市漫游者的感官政治学理论进行言说，更为复杂的序间面貌浮现而出：一方面，《小花旦》的“漫游”向现代写法迈了一步，最明显者便是《吻》中三人的漫游经历。与19世纪西方都市

人的“惊颤体验”在工业时代城多结构断裂之际以“惊心动魄”的都市漫游达成的抵抗姿态相异，王占黑笔下的漫游者总是拖着一条疲惫而带泪的尾巴，浸透着中国式“过日子”哲学中的无奈可奈何。于是，“漫游”中的尴尬与顿挫就回头指向了世俗眼光的凝视与新闻媒体的不当介入，正是这些都市人毛毛细血管的“权力”衍化成为一种遗忘志托词“模范社区”或“纪念地”式的现代暴力。

另一方面，王占黑又向传统诗学迈进了一步，其漫游叙事打破了茅盾、郁达夫等“重组上海地图”的创作路径，亦借用了王安忆《长恨歌》、西西《我城》等都市文学与“成长小说”形式勾连。一地点对应一代人，一步步走出去的“声景史”之欲望展开与繁缛不休的仿逝情调，顽固地在都市上演着一场又一场针对时间感却又富有韧性的博弈。(本文获研究生组二等奖)

2021年全国大学生“文学新作新评”获奖名单（本科生组）			
特等奖	姓名	学校	参赛作品
一等奖	朱霄	暨南大学	欲望深渊与群体救赎的光芒——评李宏伟《灰衣简史》
	朱季昕	江南大学	马华流俗中的范式突破——论《流俗地》的在地性
	郭婧	暨南大学	一场不允许失败和退出的竞赛——谈黄灯《我的二本学生》
	艾嘉辰	内蒙古大学	Venus In Feather——评波瀾短篇小说《三姐妹的羽》
	比亚兰	赣南师范大学	漂泊与找寻：于波瀾散文中展现人性的“桃花源”
二等奖	贾慧芬	华南师范大学	多元交叠，非典型复叙故事——论陈春声《受命》译札
	罗新辉	厦门大学	“非欧儿里得时间”中的历史寓言——试析长篇《民谣》的叙事特征
	方唐多多	曲阜师范大学	暗喻格下的“刀”“字”相生
	许毓溪	北京理工大学	传统的消亡：突破时空叙事看《民谣》
	黄羽彤	厦门大学	浪漫、情爱、权力：《民谣》对主流叙事的反叛
三等奖	汤海兰	广东财经大学	浪漫主义的苦行——陈春声《夜晚的潜水艇》简评
	韩旭	厦门大学	跋涉在梦与现实的泥淖——评茅瓜《致新年快乐》
	陈李潇	暨南大学	《飞鸟和鱼》：县城叙事的清与浊
	陈小武	南开大学	身体、观看与权力掌控——评张森《和自身一起的若干瞬间》
	时烁雨	南开大学	“真”与“假”背后的父子关系窥探与边缘化个体凝视——浅谈徐则臣笔下的《废火山》
特等奖	刘艳	大连理工大学	民间信仰的“圈”——评紫箫书《流俗地》
	粟梓涛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停止追问，才是分离
	钟意	中国美术学院	成为太阳的那一天——浅谈《克拉拉与太阳》
	方贝儿	南开大学	迟子建《烟火漫卷》：冰城他乡，有温情目光凝望
	蔡若姚	北京师范大学	那些静默之物也曾喧嚣——关于范子舟《皮图》的断想

2021年全国大学生“文学新作新评”获奖名单（研究生组）

特等奖	姓名	学校	参赛作品
特等奖	王秋实	兰州大学	空洞的神话与失落的先锋，评余华小说《文城》
	王振锋	南京大学	历史褶皱中的生命絮语——论王安忆的长篇小说《一把刀，千个字》
	李倩茹	山西大学	等待时间穿过的诗意叙事：读班宇的《缓步》
	宋倩楠	浙江财经大学	非虚构视角下的个体创作记忆书写——论方方的《你和我》
	刘晋欣	兰州大学	至近至远，至亲至疏——论西西《回廊》向下作作的力量
二等奖	陈舒悦	重庆大学	“雾行”时代——评路内《雾行者》
	宋昕悦	复旦大学	“都市经验”的翻新：声景·自然物·漫游实践——《小花旦》读札
	张珺	暨南大学	作为“她”的写作——评杨木《秋园》
	杜洪滨	南京大学	唐子年的董王叙事
	李雨桐	三峡大学	画像立传、“成为他人”与超越自我的可能
三等奖	陈皓楠	复旦大学	叙述·历史·时空：王尧《民谣》的叙事建构
	方文婧	吉林大学	窥视科文叙事《她们》：无法跨越的男性本位及其身份跨越困境
	姜桂香	吉林大学	故乡风景、心灵慰藉与生活质感——评红影新作《月光武士》
	董佳文	吉林大学	寻来路之所从——评徐晨阳小说《废火山》
	余燕莉	华南师范大学	《文城》、地域、历史与南方书写